



三明文史資料

第五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三明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三明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三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苏委员会编

封面设计画：郑方伟
题字：涂大楷

三明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三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
一九八七年九月

目 录

忆红四军出击打大田	郭化若 (1)
红军在沙溪河的一场战斗	邓明访 (3)
解放前三元商业活动概述	林伦榕 (6)
解放前沙县金融状况与通货膨胀	张宗健 (12)
原省立永安师范学校简史	黄孙恒 (20)
大田报业史	华满荣 (23)
三明市中医院院史	黄国先 刘 懿 (25)
刘映奎先生传略	刘振惠 刘振邦 (31)
苦学成才的陈绍源博士	张宗健 (35)
回忆刘牧群先生	张宗健 (39)
艰苦创业 殊途同归	
——解放后第一任三元县长吉乐山事略 ...	吴友平 陈上龙 (43)
我的艺术生涯	林可清 (48)
留法学生的一封信	陈绍源 (57)
质疑·补充·订正	黄寿祺 (59)

忆红四军出击闽中打大田

郭化若

红四军出击闽中，那时总司令代理前委书记，前委开完会，决定我去当二纵队参谋长，找我谈话。我说我刚来，不熟，还是当参谋吧。打了一仗就升了参谋长。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说先打了大田，打转的时候再打漳平。我说我可以证明，先打了漳平，再打大田，再打转。他们不信，说这是你一个人讲的。真是没有办法，你们写党史，不能发脾气，下命令，不能压服人，后来我去找了刘型，他的记性很好，他说：“漳平是去的时候打的嘛。”我们搞清楚了，是去的时候打了漳平，回来时张贞派了两个团来追我们，我们就绕到了那边，把他的后卫打了一下。

到了闽中，说是掉队很多，不是事实，因为不通语言，掉队以后，吃饭都没有地方，不敢掉队，掉队最多的是侦察通讯人员，因为他们第一天被派出去，等到第二天回来时我们已经走了，找不到队伍，损失了一些。说是伤亡很大，不是事实。我们闽中行动打了大田，那里敌人筑了土堡，有人说伤亡很大、几百人。我在前面，二纵队是前卫、军部在中央，三纵队在后边，我是二纵队参谋长，在队伍的最前头。前面战斗一个连，后面就是我。打了两枪有几个伤亡，我们就停止了。朱老总下命令不要打了，要我以前委司令官的名义写信给这个土匪部队（卢兴邦驻大田股匪）。这封信是我亲手写的，就是请他们借路给我们通过，表示不损害他们。他们不同意，说不能同意我们通过，如果我们

晚上撤退，就不打我们，我们就在晚上撤退了。他们不但没有打我们，还把我们十多二十个伤员包扎好后用担架抬着、派人送回来，所以不是有些材料说的伤亡很大。我在前面，伤亡很大我怎么会看不到呢？最多不过几十个，几十个中还有一些是受伤的，因为我们没有再冲锋嘛，刚开始打一下就停止了，我们没有再冲锋。

……闽中的行动是正确的还是错误呢？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朱老总在出去以前开了会议，毛主席也参加了嘛，也同意嘛。……打闽中是一次试探性的行动，当时红军还没有发展到打运动战的阶段，敌人来包围，还不能集中力量打破敌人，而是跳出去，所以不能写是路线错误。

……闽中行动，红军在闽中很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当时在，我参加宣传，参加写标语口号。

（大田县委党史办华满荣根据郭化若同志谈话录音整理，与大田无关部份从略）

红军在沙溪河的一场战斗

邓明访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红军第七军团十九师在师长周建屏率领下，从建宁、太宁、将乐、清流及明溪一带，分四路会师于三元县列西后山。当天下午，红军部队络绎不绝地向列西方向前进，先头部队还不时向天上开几枪，老百姓开始感到有些害怕，有的跑到外村亲戚家去住，有的跑到山上躲藏。

红军会师后有二个侦察兵到街上买豆腐脑吃，老百姓见拿枪的，知道是红军，感到有些紧张，不一会儿，又从后山下来一些红军战士，他们个个态度可亲，不断向老百姓宣传红军政策，有的向老百姓借水桶、扫帚，有的用石灰水在街头巷尾墙上刷写“打倒国民党！”、“消灭国民党八十师！”、“打倒土豪！”等标语，落款均是红七军团。这样，渐渐消除了老百姓的胆怯心理。有的老百姓请红军吃饭，都被红军婉言谢绝了。

那时，国民党八十师所属二三九旅旅部设在莘口。在红军会师当天，这个旅部的两个国民党军官太太从莘口乘船到列西，船要靠岸时遇上红军哨兵的阻拦。为封锁消息，红军不让船靠岸，两个女人还以为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就气势汹汹的叫嚷：“我们一定要上岸！”红军战士被激怒了，就拔出手枪，亮出身份。这可吓坏了这两个女人，她们慌忙调转船头，往水东（列东）靠岸，并在水东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营部里打电话向旅部报告。

国民党二三九旅接到报告后，立即调集驻扎在莘口、三元一带的全部兵力及当地大刀会（三元当地武装），共有几千人，分

布在城关、列东、徐碧一带河畔，准备阻击红军过河。那时这一带河边，全部生长着大树林和羊姜树，高的四、五米，矮的也足有二米高。

与此同时，红军也在列西河畔，架设了机枪、土炮等，做好强行过河的准备。论实力，当时红军有万把人，战斗实力比敌人强，但敌人隐藏在密林中，红军看不清有多少伪军和大刀会在埋伏。

五月二十八日，红军加紧了渡河准备，并在列西一带共收集了各种船只及过路商船三、四十条。

五月二十九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红军为试探敌情，派第一条船从列西观音阁城门前开出。船刚驶到河中，就遇到了敌人的火力阻击，尽管红军同时进行了猛烈反击，但这条船还是被敌人打翻，船上四、五十名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这条翻船顺水漂流到徐碧后，敌人发现船上还有一个受伤的红军战士及船夫耐桃（列东人），就用大刀会的刺刀杀害了他们。这个红军战士临死前表现得十分顽强，他慷慨激昂地对敌人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们马上会消灭你们的，你们决没有好下场！”

战斗打响后，红军渡河战斗全面展开，刹时间，沙溪河两岸枪声四起，战火硝烟，弥漫天空。红军部队一万余人，从翁墩、列西、白砂及三元（今火车站）分四路强渡沙溪河，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在红军强大攻势下，敌人溃败，分二路往城关，徐碧方向仓惶逃窜。

往城关逃跑的敌人，大部分被红军围歼消灭在白砂一带，其余敌人往莘口方向逃跑。

另一路往徐碧方向逃窜时，红军部队已抢先占领了高岩甫山头。就在这时，住扎在沙县的国民党八十师二三八旅两个工兵营，全副武装赶来增援，敌人到碧湖后，抓了当地两个农民带路，走到碧湖小桥后，敌人将一个农民绑在大树头上，另一个农

民被打死在路上。

在徐碧，红军与赶来增援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红军占领高岩甫山头等有利地形，最后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连同往徐碧逃窜的敌人，除少数从河里游窜溜走外，大部分被红军歼灭了。

战斗结束后，沙溪河水象一片血海，在河边，敌人的死尸左一堆右一堆，足有六、七百人之多。在这场战斗中，红军缴获敌人枪支八百多支，机枪二十挺、迫击炮三门、子弹十万余发。敌二三九旅旅长被击伤，毙死团长一人，营以下官兵伤亡惨重，给敌人一次致命打击。

战斗胜利后的当天下午，红军在城关城南的太堡庙，把从当地地主、恶霸那里没收来的布匹等物资，都分给了贫苦农民。同时，把抓获的二百多名俘虏押到徐碧黄植旺家房前大坪上，召开了投降缴械大会，红军首长给他们讲了有关政策。

五月三十日，红军部队在列东、徐碧山头又住扎了一夜。第二天分别向廖源、杜水、湖源方向进发。

解放前三元商业活动概述

林 伦 榕

一

因时局动荡变化，解放前三元的商业兴衰，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抗日战争前期，人民生活水平低，所以日常生活消费品，品种简单，市场萧条，土特产大多向外埠找销路。二、抗日战争时期，因省属机关内迁三元等地，日常生活消费品需要量增加，内地市场突然兴盛起来。三、抗战胜利后至解放战争时期，农副产品贸易和土特产外销，兴旺与萧条交替起伏，许多大户巨商和小商贩由发迹、发财到最后走向破产。

三元是人少地多，物产丰富的避远山区，明嘉靖《沙县县志》：“惟人文甲于一邑，麦豆蜡果绢布为各都之冠，饶有余利”。解放前三元县只有三万多人口，人民生活水平低，但有良田十二万余亩，粮食自给有余，每户年养二三头大肥猪，家家鸡鸭成群，供本县消费绰绰有余。本县有沙溪、东牙溪、碧玉溪、台溪、黄沙溪、沙阳溪、扁担溪等溪河，可捕捞到鱼虾鳖等供应市场，加以城关、列西、列东有一百多口小鱼塘，陈敦、大元等地稻田养的草鱼、鲤鱼、鲫鱼，足可满足过年过节市场供应。

本县有九十万亩山林，有世代采伐不尽的木材、毛竹，还有丰富的竹笋、香菇、红菇、油茶、棕、板栗等土特产品和猎取不尽的飞禽走兽。这些价廉物鲜的山珍美味，贫苦劳动人民，无法享受，他们节衣缩食，设法将所获卖出去，换回不能缺少的生产和

生活资料。

二

抗战前三年每年产二万担白笋干，二万多立方米木材，万斤香菇，还有土纸、茶叶等土特产商品，尤其是白笋干和木材畅销外地，不但赚进大量货币，还换来布匹等工业品和食盐等海产品。三元城关有木，笋巨商邓纪于，商号叫“松吉桓”；邓际和，商号叫“五昌忠”；邓善如，商号叫“金吉如”；还有李景扬，邓增喜，邓际清。列西有黄某某，绰号“苏州超”，张坑有揭姓家族揭朝顺，揭升顺，揭廷祯（住莘口），均是大笋商，莘口木笋巨商有邓家进等。这些人皆来往于福州、苏州，上海，专门经营笋干、木材。在福州有专设的延平会馆，在上海、苏州有沙永公所，它们既是土特产交易所，又是贸易业务机构，均设有仓库。据估计，每家年经营额少则几万块，多则十几万块光洋。经营产销较稳定的白笋干单项，年总金额二百万块光洋以上，有的年份木材经营金额要超过白笋干。民国元年因时局未稳，人心未定，三元有的巨商大户搬往沙县、南平城内“避难”，不敢外出经营笋干，木材，惟有邓俊鹏敢于冒风险，他借资将二百多担笋干运往福州出售，每担二十五块光洋，顺利地获利一倍多。从此他的胆子更大了，扬言要去上海，所以城关、梅列、莘口等所有老笋商，都愿将笋干交给他。他定价收购每担十二元，且只要回头钱。邓俊鹏将大批笋干运至上海，每担笋价三十六块光洋，大获巨利，然后，他将银元装入水缸底层，上层装铁钉伪装，共分十三条船运回三元。据他自己说，除一切成本和开支，纯利七十万块光洋。抗日战争开始后，海路不通，木材，笋干没有销路。所以笋山荒芜，竹笋生长成密密麻麻的毛竹林，笋一年比一年

少，产量大幅度下降。

抗战胜利后，老商户、新发户，随着省属机关搬到福州，在省城开展商业活动。首批有邓绍乾等十多人筹资一百股，每股二两黄金，开办“敦泰商行”，综合经营木、笋、纸等土特产。接着又有邓象坦、邓老增、邓清晏，李布周、林某某、邓衍庠、邓绍禹等三十多人筹募投资二百股，每股一两黄金，开设“三元商行”，专营木材。不久又有邓哲夫、陈祥坛、林幼石等筹二千两黄金开办“永泰祥商行”，后来列西黄子宁用他自己的资本经营木材，赚到几百两黄金，招了一些股东，开办了“瑞元商行”。

这些商行，不但直接经营木、笋、纸，还搞代购代销，手续费3—5%，同时贷款投放给木、笋小商小贩，生意做得灵活，商行利润很高，头年就把六、七千元的商行房产买下来，第二年又扩大商行房地产和资本，并大分红利。然而好景不长，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治腐败，物价暴涨，货币贬值，小商贩深受其害，商行内部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最后谁也逃脱不了破产厄运，黄子宁几百两黄金尽付东流，邓绍乾因势去财空而自杀。

三

除以上少数大商贩外，三元以中小商业为主，更多的是豆腐小商店。抗战胜利后，保持下来的有“叶福和”、“翁宝美”等五家京果店，“美中有”、“美中来”三家糕饼糖果店，邓肥洪，林新起等十七家烧饼店，“秀吉号”、“芳吉号”等十一家米糕店，矮金等五家菜馆，邓有木，罗炳等八个屠户，邓崇慈、邓栋钦等八家面食点心店，邓绍禹等十五家酒店，李永清等二家米店，李发连，邓崇密等九家日杂店，爵兴安、爵兴财、爵兴生等六家布匹百货店，“复源春”、“万和堂”、“人寿泰”、“邱生

记”七家中药店，李银治，邓水妹、陶西等金银首饰店，新发盛等烟丝加工批发店。至于豆腐店就更多，经常营业的就有三十七家。三元各地的豆腐都是游酸（头一天的豆腐水）豆腐，家家讲究优质，抗战胜利后因供不应求才有四、五家做石膏豆腐供应机关单位。

三元城关豆腐店之多，多得出奇，约平均二十五户居民就有一家豆腐店，常年性的三十七家豆腐店分布均匀，从中山路的太保庙起，一直到传柑路转入凤岗路都有豆腐店，长安堡（现火车站一带）就有三五家豆腐店。农忙及年节时，崇宁堡城关城尾、阳巷头还有临时豆腐店，所以过去三元街被称作豆腐街。传柑路与凤岗路接头处，迄今仍被俗称“豆腐街角”，有一半豆腐店兼卖老酒或日杂，另一半豆腐店的劳力兼其他劳动或种菜。每家豆腐店每天清早做八至二十斤黄豆，逢年过节时有的多做一锅或做到满锅十二斤，以满足供应。传柑里有邓椿钊等六、七家专做豆腐乳干，日常供应城关，墟日运往莘口、梅列市场。豆腐乳干，可蒸吃，可腌吃，很受农民欢迎。

中国的豆腐誉满全球，既有营养，又好吃，三元人好吃豆腐，好吃得出奇，不然这么多豆腐店，做这么多的豆腐怎能销得了？仅千户人家的城关，平时街上看不到卖青菜的，青菜自种自食，但每天早上总得去买三、四块豆腐蘸酱油吃，有客人总得有一碗煮豆腐，红白大事请客，少不了煮豆腐、煨豆腐、豆腐丸，大年三十，大家吃了煨豆腐、炸豆腐之后，还得恭恭敬敬装一碗清水豆腐和几株大蒜跟冬笋一齐放在饭甑上隔年，表示有“大富”的好兆头。墟日，各地大街小巷摊贩多是煮豆腐，烤豆腐、炸豆腐。点心吃豆腐花，喝酒配烤豆腐干，做新灶、搬新房、送礼样样离不开豆腐。其主要原因是原料充足，三元每年出产13000担黄豆，所以豆腐店长盛不衰。

四

三明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了农副产品的流向，历史上长期固定下来的交易机会是墟日，它是农民自产自销农副产品，交换工业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广泛市场，也是小商贩远途贩卖、摆摊设点的好地点。三元每逢一、六（农历初一、初六、十一、十六、廿一，廿六）为墟日。这天，除城关、梅列等地小商贩赶来杜水墟，摆摊设点或收购农副产品外，前村，张坑、筠竹、米洋、吉峰、草洋、顶太、蕉坑等周围农民以及沙县湖源、大田县铭溪、广平等地农民，都赶来杜水墟。杜水墟除一般农副产品外，还有黑笋干、鸡、鸭、蛋、鳅、鳝、小虾。逢“一、六”是沙坪墟，聚集着渔溪、台溪等附近小村及明溪县夏洋、地美的农民及列东、列西、城关的小市民。每逢“三、八”在列东老街集墟，集中了广平、湖源、阳溪、碧溪、地美、沙坪，城关，中村、杜水的小商贩及农民。农忙时约有千人，农闲时有二三千人，这里除了农副产品外，还有健壮而又长得快的徐坊、列东小猪，质地纯白而又幼嫩的龙岗粉干，列西的红粬，洋山的芦尾扫帚，腊月年关时还有大量球糖和草鱼，在西南半县有每逢“三、七”的星桥墟及明溪县沙溪墟，逢“三、八”是岩前墟。岩前比别的墟场更有利，有一条小河流，上至沙溪墟下至莘口，可通行“棺材”小船，每船载一吨，可把岩前、沙溪、星桥等墟日的货物运出，又可赶上逢“四、九”的莘口墟。

莘口墟场，是三元、永安、沙县、明溪四县的自然经济区域，每逢“四、九”墟日，有近万人之多。

市场商品花色品种齐全，数量多，销售额大，各种干鲜笋、各种菇类，瓜果蔬菜，盐油酱醋和布匹百货以及铁制农具，猪、牛、鸡鸭、蛋类，大米，黄豆，笋干以及竹木柴炭样样都有，琳

琅满目，任你选购，因此莘口曾被称为沙溪的“小上海”。

但在解放前夕，由于物价暴涨、货币贬值，经商艰难。农民林梅老卖给沙县小贩一船西瓜（约3000多斤），交钞票时不数张数，只数几捆装了一麻袋，第三天回莘口只能买到150斤稻谷，等于二十斤西瓜换一斤谷。做了几十年小商贩的李发连，邓祚鼎等人，就是在解放前夕做了亏本生意，弄得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因此市场萧条，商业冷落，最后逼得当地人民只好使用银元银角和铜板，维持社会部份货物交换，政府的纸币失去信用，几成废纸。

解放前沙县金融状况与通货膨胀

张宗健

金融是对货币流通和银行信用有关的活动而言。而通货膨胀，则是指发行的纸币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两者对于经济繁荣与否和人民生活好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沙县地处闽北山区的中心，沙溪河贯穿其间，资源丰富，土特产品繁多，素有“金沙县”的美称。而交通也比较方便，历来商旅云集，舟车辐辏，行商坐买，网点林立，金融活动，盛极一时。

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所控制的中国、中央、交通、农业四大银行，大量滥发钞票，促使货币贬值，物价陡涨，一日数变。从而给人民带来的生活灾难，空前未有。笔者耳闻目睹，记忆犹新，回想起来心中还有余悸。

货币乃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作为商品价值，直接体现社会劳动，反映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货币的稳定与否，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具有决定性的重大影响。解放前沙县的金融情况，就是一个显明的缩影。就我个人所知分述如下：

（一）货币的种类和沿革

我国古代最早使用的货币是“贝壳”，所以“买”“卖”下面都用“贝”字。到了商代改用“铜贝”为我国最早的金属货币，接着又有“布币”，“刀币”的产生。《史记》有“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刀布之币与焉”之说。历代货币种类繁多，

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金属币：银锭、制钱、银元、铜片、镍币等；二是纸币：皮币、纸币、庄票、汇票、本票等。历史上在沙县流通的有：

（一）银 锭

银锭是熔铸成块的白银，是古代一种秤量的货币：形式不一，轻重有别，从春秋时代起就有“银锭”和“元宝”流通使用，历代相沿，到了明朝中叶才盛行。清朝的货币制度，采用银两和制钱平行本位制，其银锭形式和重量有四种：“元宝”：形似马蹄，又称“马蹄银”，重约五十两。“中元宝”：状如锞子，又叫“锞子锭”，重约十两。“小锭”：重1—5两不等。“碎锭”有“福珠”、“滴珠”等名称，重在1两以下。一直使用到一九三三年废两改元才停止使用。

（二）制 钱

制钱是一种按照国家定制，由官炉铸造的铜钱，始用于秦始皇统一币制时所铸造的方孔钱，推行全国，历代相沿袭用，形式不变，其影响长达二千多年之久。明洪武元年（1368年）公布《洪武通宝钱制》，设局铸造钱币，叫“制钱”。清沿明制，但到了嘉庆以后，小钱杂出，质量降低，咸丰年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兵饷不足，而且铜材缺乏，改铸当半、当百、当千等大钱和铁钱，更加私铸蜂起，制钱质量越来越坏，钱币十分紊乱。人们对这些杂粗滥造的钱，称为“粗钱”。在市面上经常遭到拒用，商人只好用棕榈或麻绳十文一串捆起来使用。到一九三四年以后，沙县市场上流通绝迹。但残存在民间的尚有少数“康熙”、“乾隆”、“咸丰”、“光绪”等通宝。

（三）银 元

银元俗称“花边”，明万历年间（公元1578—1620年）由外国流入中国，最早是墨西哥的“鹰洋”，沙县叫“鹤婆番”，也叫“大洋”、“光洋”、“番洋钱”。每隻银元重库平七钱二分。此外